



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

梓 业 集

——王璞子建筑论文集

王璞子 著



紫 禁 城 出 版 社

TU-092/73

2007



故宫博物院
学术文库

梓业集

——王璞子建筑论文集



王璞子 著

紫禁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梓业集：王璞子建筑论文集 / 王璞子著.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2007.7
ISBN 978-7-80047-471-2

I. 梓… II. 王… III. 古建筑—中国—文集 IV. TU-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3997 号

梓业集 ——王璞子建筑论文集

王璞子 著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景山前街故宫博物院內)

北京恒智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520 千字 印张 22.5

2007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978-7-80047-471-2

定价：78.00 元



王璞子 简历

王璧文先生，字璞子，以字行。1909年1月生于河北正定，1928年考入中法大学，1933年进入中国营造学社，1945年抗战胜利后，供职于北平市政府工务局文整处。1952年，在宣化市政府建设科任工程师。1956年任中央二机部第一设计院工程师。1956年底调入故宫博物院，先后在工程队、古建管理部任高级工程师，直至1988年因病去世。

王璧文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建筑史研究，为元大都的早期研究者，并长于建筑法式的研究，主要论著有：《中国建筑》、《清官式石桥做法》、《元大都城坊考》、《凤凰嘴土城》、《燕王府与紫禁城》、《〈工程做法〉评述》等。

目 录

元大都城坊考	(1)
元大都寺观庙宇建置沿革表	(31)
元大都城平面规划述略	(58)
辽金燕京城坊宫殿述略	(86)
燕王府与紫禁城	(116)
南苑建置考略	(128)
中国园林建筑	(137)
陈设	(158)
凤凰嘴土城	(176)
中国建筑之特征及其演变	(180)
太和门的被毁和重修	(198)
紫禁城的总平面布局	(201)
《工程做法》评述	(205)
清官式石桥做法	(276)
清官式石匣及石涵洞做法	(329)
清初太和殿重建工程	(347)
后记	(357)

元大都城坊考

一 沿革

元大都（今北平）古冀州地，唐属幽州范阳郡，其末季，刘仁轨尝据以僭帝号^①。石晋时地入于辽，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立为南京，又曰燕京，是为北平奠都之始^②。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因辽南京旧址拓而大之，号曰中都^③。元太祖十年克燕，初为燕京路，总管大兴府。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复曰中都，四年于旧城之东北，创置新城，始迁都焉。九年改曰大都^④。降及明清，并因之为都，称曰北京^⑤。逮至民国，仍而未改。十七年国都南迁，乃更名北平。故言北平建置沿革者，应以唐以前属之第一期，辽金为第二期，元明清为第三期。而吾辈今日所见之城阙宫殿，虽多数为明清二代遗迹，然究其嬗递因革之原，不能不以元大都为起点也。

二 大都平面配置之概状

（一）宫苑庙社

大都城平面为南北较长之长方形，辟十一门，南面中央曰丽正门，东曰文明，西曰顺承；东面中央曰崇仁，南曰齐化，北曰光熙；西面中央曰和义，南曰平则，北曰肃清；北之东曰安贞，西曰健德。盖唯北面二门，余皆三门也。丽正门之内为千步廊，次宫城，又曰大内，中有殿曰大明殿，凡登极寿节正旦会朝诸典，率举行于此，所谓国之正朝也。宫城之北为御苑，苑北为钟鼓楼，适居城之中央。苑之西则为太液池，池中有万寿山（或曰万岁山）正当大内之西北，殿阁巍峨，松桧丛郁，诸帝游幸之所也。池之西岸又有二宫焉：曰隆福，曰兴圣，隆福在兴圣之前，乃皇太后颐养之居；兴圣在后，以处妃嫔，并称为西内，即明萧洵《故宫遗录》所谓西宫海子者是也。明初燕王

建国，因其地营西宫，永乐中改建都城，遂并入西苑^⑥，今北海西岸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编者）及集灵囿一带，即其遗址。隆福宫之西南，又有西御苑，以处先朝后妃，约在今大光明殿及图样山之地。大内及西内之外，绕以萧墙，其制若明清之皇城，包括宫城、西内及太液池于内，乃皇宫之外围也。综上所述，知元之宫苑，皆萃集于大都南半部之中央，无一位于钟鼓楼以北也（图一、二）。

宫城左右，庙社分据，在左者为太庙，位于齐化门内偏北。《元史》卷七四《祭祀志》谓：“门外驰道抵齐化门之通衢。”按今朝阳门，元之齐化门也，今大街北有大慈延福宫，即其遗址矣。社稷当宫城之右，在和义门内稍南，事见《元史》卷七六《祭祀志》。揆此二者，一在宫城之东，一在其西，与宫城鼎足而三，而其位置同属于都城之南部，自此以外，殆全为坊市所据焉（图一、二）。

（二）坊市

大都城内共分五十坊。坊与坊之间，配列平直宏阔之街衢，极为壮观，具见西人沙利宁氏（A. T. H. Charignon）《马可波罗游记》（Le livre de Marco Polo）：

因街道之宽而直，吾人能立于街之此端，得见彼端，或于某城门得见相对之城门，全城除华丽之宫殿外，有许多宏大旅社及高贵宅第。^⑦

街之宽度，据《日下旧闻考》卷三八引《析津志》，复有大街小街与巷街之别：

街制，自南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大巷，二十九街通。

据上文所示，此整齐划一之街衢，在营建当时，殆必先为严密之计划，然后以次施行，不难推想而得。而迁都之际，民舍面积，复规定以地八亩为度，见《元史》卷一三《世祖纪》：

至元二十二年二月壬戌，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贵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揆其定制，则必预划全城为若干方形面积，又可知矣。且当时自金中都迁居新城者，类多官吏士绅之辈，以其经济上之充裕，故营建亦率能宏壮整齐，合乎规制。关于此事，西人喜仁龙（O Sirén）《北京城垣及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引《马可波罗游记》：

房屋之建筑，均系成四方形，以宫殿及附属之庭院园林所占之方形面积为多，其余则颁给各巨族，每一方地，环有商业会集之街衢，是以全城之形式，俨若棋盘，此种分配之完善，可谓最公平者也。^⑧

纪述最为明晰，殆可与唐之长安，先后媲美矣。惟城中坊巷，是否全部皆有民居，如今日之稠密程度，则不无疑问。盖据著者观之，元大都繁华之区域，当在钟鼓楼及其东西

二侧，即今之东四牌楼与西四牌楼附近，而北部实极荒凉，试察《析津志》记述街市之地点（表四）可以明矣。尤以元代留存之寺观证之，如白塔寺（今妙应寺）及大崇国寺（今护国寺）诸寺，皆散布于城之中部，而今日北郊一带，除少数明清建筑外，几无元代遗迹可认，足窥洪武改缩元城之北部，不为无故也。

（三）平面配置之原则

如上所述，元大都之平面配置，殆可以“面朝背市”及“左庙右社”二语尽之。考我国古代都城制度，以《周礼》冬官《考工记》所载者为最早：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今以大都城核之，其宫城与苑囿，皆在都城之南部，而建庙社于其东西，坊市民居，则区划于城之北部，可谓与《考工记》“左祖右社，面朝背市”，如出一臼矣（图一、二）。按元以异族入主中华，其文化程度，实远逊于汉人，故世祖之营大都，不惜变更其宗国固有之习惯，而唯汉法是遵，观乎《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传》：

会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谓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如何？

殆可征矣。虽然，其所以至是者，亦由耶律楚材、刘秉忠诸人擘划之力居多。考楚材、秉忠皆以儒术见任世祖，凡所施設，皆以我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如《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楚材又请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臣梁陟、王万庆、赵普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弟，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由是文治兴焉。

及同书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四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官室，……他如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

足证元代建国之初，典章制度，咸出二人之手，故大都营建之役，虽工官中有也黑迭儿其人，隶籍域外，而其宫阙制度，仍能与礼经相符者，职是故耳。

三 都城

（一）制度及结构

大都城建于世祖至元四年^⑨，城之制，《元史》卷五八《地理志》曰：

城方六十里，十一门：正南曰丽正，南之右曰顺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东曰安贞，北之西曰健德；正东曰崇仁，东之右曰齐化，东之左曰光照；正西曰和义，西之右曰肃清，西之左曰平则。

据上文所示，都城东西南三面各有三门，北面二门，盖为十一门也（图一、二）。按之同书《百官志》及元陶宗仪《辍耕录》，王士点《禁扁》诸书，其数目及名称，悉相吻合^①。惟《马可波罗游记》（Le livre de Marco polo）谓：“都城每面三门，共计十二门”^②。法人普意雅（G. Bouillard）并承其说^③。然《元史》、《辍耕录》诸书均明言门数十一，而北面仅辟二门。又据《明太祖实录》：

洪武元年九月戊戌，大将军徐达改元都安贞门为安定门，健德门为德胜门。证之，亦可推定其北实为二门，盖当时如为三门，更名之际，岂无声述？再者，元城门之名，除安贞、健德、崇仁、和义四门，于明初即已改称外，其余悉仍其旧，直至英宗正统间，始易今称^④，揆其位置及数目，悉能符合十一门之数，足证马氏“十二门”之说，实误记也。都城每门之外，合设瓮城吊桥，所以严警备而固守卫也。然据《元史》卷四五《顺帝纪》：

至正十九年冬十月庚申朔，诏京师十一门皆筑瓮城，造吊桥。

其制盖自顺帝始，足证大都初创之时，各门仅具城门一重而已。又吊桥结构，以木为之，故明初尚沿其制，迨正统间，始改为石桥焉^⑤。

关于城楼角楼之设置与否，详考历来载籍，鲜有及之者，仅《马可波罗游记》谓：“每门之上，及每城角之上，均有宏丽之殿一”^⑥，揆其所谓“殿”者，实即今之城楼及角楼也。按城门及城隅设楼之制，我国古已有之，所以严守备壮观瞻也^⑦。元世醉心汉法，对于此制，未必不模仿之。尤以元代角楼之建，如离宫太庙寺观，无不设之，都城首善之地，观瞻所系，万无减略之理^⑧，而马可波罗（Marco polo）复亲历其境，于此庞大宏丽之建筑物，言之必有所本也。

大都城垣之结构，据《日下旧闻考》卷三八引《析津志》：

世祖筑城已周，乃于文明门外向东五里立苇场，收苇以蓑城，每岁收百万，以苇编排，自下砌上，恐致摧塌。

审最初之制，实为土垣，而墙面蓑以苇衣，非若今城内外悉甃以砖甃也。又据元《经世大典·政典总叙》，记述军役职务一节，有“砍苇被城上”一款，足证《析津志》所述，实非虚妄^⑨。关于此事，其记述尤为显著者，尚有《马可波罗游记》及《洪武北平图经志书》二书，均言城为土城^⑩。前者并详举其高厚尺度谓“墙高十余步，墙根厚十步，顶厚三步”^⑪，苟所记准确，则墙之上下宽度，约为三与一之比，以较《大清会典》及《城垣做法册式》所定三与二之比^⑫，则大都城垣之坡度，极为缓和，足为土垣之又一证据也。更检《元史》诸帝本纪，自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迄顺帝至正十年

(1350 年) 近 80 年间关于修缮都城之记载, 竟至 15 次之多^②。观其兴葺之勤, 亦可推定其非为坚固耐久之工程也。兹列表以明其概 (表一)。

表一

修理次数	年 月	公 元	每 次 相 距 时 间	备 注
第 1 次	世祖至元九年四月	1272	大都城建于至元四年第 1 次重修距创建时仅 5 年	
第 2 次	二十年六月	1283	距第 1 次修葺计 11 年	
第 3 次	二十一年五月、七月	1284	距第 2 次计 1 年	
第 4 次	二十七年六月	1290	距第 3 次计 6 年	
第 5 次	二十八年七月	1291	距第 4 次计 1 年	
第 6 次	二十九年七月	1292	距第 5 次计 1 年	
第 7 次	成宗元贞二年十月、十一月	1296	距第 6 次计 4 年	
第 8 次	英宗至治元年八月	1321	距第 7 次计 25 年	
第 9 次	二年三月	1322	距第 8 次计 1 年	
第 10 次	三年六月	1323	距第 9 次计 1 年	
第 11 次	泰定帝致和元年正月	1328	距第 10 次计 5 年	
第 12 次	文宗天历二年六月	1329	距第 11 次计 1 年	明帝纪作七月
第 13 次	顺帝至正三年七月	1343	距第 12 次计 14 年	
第 14 次	八年五月	1348	距第 13 次计 5 年	
第 15 次	十年三月	1350	距第 14 次计 2 年	

据上表所示, 其每次重修相距最长之时间, 为 25 年, 最短者一年, 其余或十余年, 或四五年不等, 而自成宗元贞二年 (1296 年) 至英宗至治元年 (1321 年), 25 年间, 是否曾有重修之举, 抑为史书遗漏, 尚属疑问。窃以世祖一朝, 自创建之后, 重修者凡六次, 而英宗三年之间, 辄三修之, 自非土垣, 当不致颓毁如是之速? 更察其役军数目之众, 动以万计, 其非小规模之修葺, 又可推知。综合以上诸说, 元都城之为土垣, 殆

少疑义矣。至于今北平城经明洪武一度改修，甃其外侧，故当时有“创包砖甃”之记载^②，迨英宗正统中，复又甃其内面，始成今式^③，依此，益足证大都城之为土垣良非诬妄。

（二）位置

都城位置，据《元史·地理志》，谓在金中都故城之东北。按中都城创建于海陵王天德三年，因辽南京旧城增拓而成^④。其城当为北平城之西南，与今城一部相环接，见奉宽《燕京故城考》及日人那波利贞《辽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⑤。而今之北平城，乃明清之旧都，因元大都城修治改筑者也。据《明太祖实录》：

洪武元年八月丁丑，大将军徐达命指挥华云龙经理故元都，新筑城垣，南北取径直，东西长一千八百九十丈。

及《日下旧闻考》卷三八引《寰宇通志》：

洪武初，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废东西之北熙肃清二门，其九门俱仍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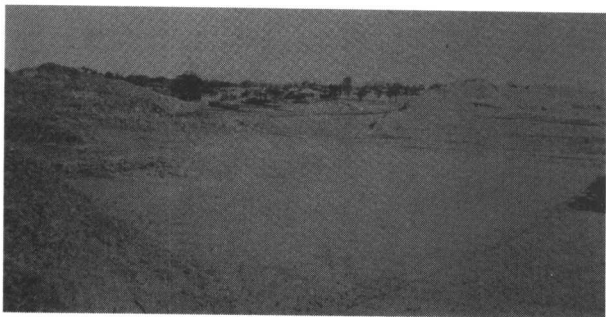
又据《明太宗实录》：

永乐十七年十一月甲子，拓北京南城计二千七百余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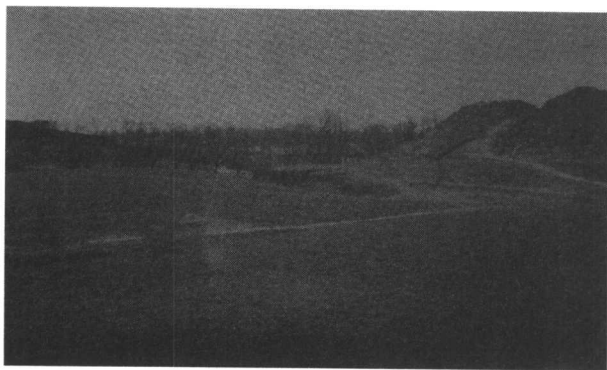
是洪武初，仅缩其城之北面，至永乐定都兹土，又拓其南面，遂成今状耳。今北郊有土阜，环屏城之正北，俗呼为土城。其平面作门形，随其东西北三向，又有东土城、西土城及北土城之称（图一、二、一一、一二、一四、一五、一六、一七）。按北土城之方向，与今城北垣平行，且相距五里许，适与洪武缩入之数符合，而东西土城直达今城北面之东西两角楼（图七、八），观其形势，即洪武帝所废大都城北面，及东西迤北光熙、肃清二门之土垣也。且北土城有两大豁子，直今安定、德胜二门，俗呼为东西小关（图四、五）。按其位置，实即安贞、健德二门之遗址。而东土城之光熙门豁子，或称红桥豁子（图三），又与西土城小西门豁子（图六）遥相对称，亦与元光熙、肃清二门相当。今小西门豁子之外，复有半圆形之土垣（图九、一〇），或即顺帝至正中所筑瓮城之遗迹欤？更观今土城外之地形，恒较凹于平地，疑为元护城濠之旧迹：盖以西小关外残毁之石桥（图一三），及其西干涸之河道证之，其河直贯东西，与北土城平行，虽石桥非元代之旧，而现存之河道，谓为当日之护城濠，殊有可能。

或谓今城东西两垣，经明初缩入，已非元城之旧址，如近人奉宽《燕京故城考》，元大都一节即持此说者也。其言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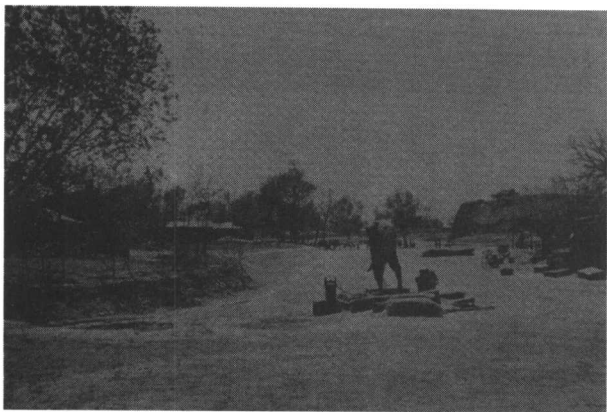
若夫京城之东西两垣，明初大致虽因元旧，然较之旧基，似略形收缩，何则？今北郊元代土城，环抱今城北面，审其长度，各展出东西两角楼以外，东方所展尤多，与今城东西垣不成南北直线，是可知也。



图三 光熙门豁子



图四 东小关（安贞门）



图五 西小关（健德门）

然遍征诸书，咸谓明初改筑，仅缩其北面，未云曾改其东西两垣。且法人普意雅（G. Bouillard）测量之图，东西土垣之位置，并未较今城有所展出或缩入。而著者踏查结果，亦明明与今城东西垣南北成一直线（图一、二、一一、一二），足证奉宽所云，固未亲历其地，作精密之考察也。

都城南垣展拓之举，始于永乐十七年，《实录》明言之矣，惟其时南展之里数，详考诸籍，鲜有记录，然征诸实物，厥有四点，可为佐证，并由此可推元城南垣之位置，兹列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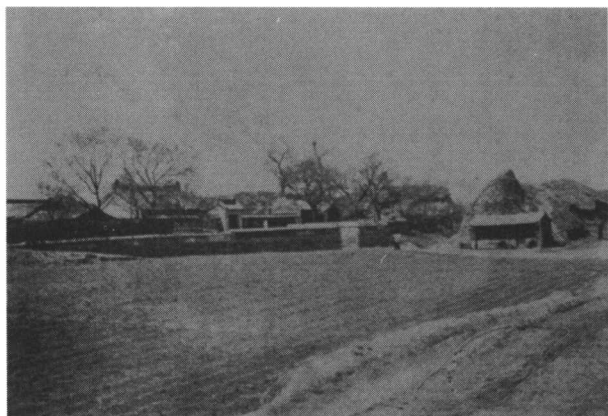
1 庆寿寺双塔 据《日下旧闻考》卷三八按语：“……考《元一统志》、《析津志》皆谓至元城京师，有司定基，正直庆寿寺海云、可庵二师塔，敕命远三十步许，环而筑之。”及同书卷四二引《析津志》：“庆寿寺西有云团师与可庵大师二塔，正当筑城要冲，时相奏世祖有旨，命圈裹入城内。”按庆寿寺今名双塔寺^②，在西长安街路北，双塔尚巍然矗立，南距今城南垣约一里半，元城既环塔南三十步，其旧址似即今长安街稍南之地，而其他部分，亦必与双塔同在

一平行线上，故可断定元城之南垣，实在今垣之北约一里数十步，至一里半之间也。设此说非诬，今之天安门东西长安街，及东西单牌楼稍南，当为元城南面城垣之旧基（图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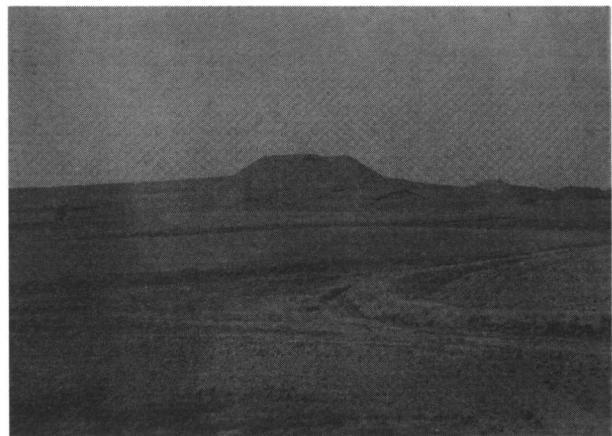
2 观象台 据《春明梦余录》卷五九：“观象台在城东南隅”及《明一统志》：“钦天监设司天台于朝阳门城上”，其地即今城东南角迤北约一里余。光绪《顺天府志》，《燕

京故城考》及西人喜仁龙（O. Sirén）所著《北京城垣及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均谓此台为元之司天台，并谓其地乃元城之东南角^⑧。按元司天台又名灵台，建于世祖至元十六年，据杨垣《太史院铭》谓台在都城东垣下太史院中^⑨。又据《日下旧闻考》卷三八引《析津志》：“明时坊在太史院东”，是院址犹在坊西，与城东垣尚有相当之距离，足证元时台址与今台实不相涉，而今台非元之旧可知矣。虽然，谓今台为元城之东南交角，其说或可征信，盖今台南距今城东南角楼约为一里又五十余步，与前述庆寿寺双塔距今城南垣之距离约略相等故也（图一、二）。

3 城隍庙 今西城城隍庙街之城隍庙始创于元，而经明世重建者也^⑩。其事见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三《大都城隍庙碑》：“七年太保臣刘秉忠……请立城隍神庙，上然之，命择地建庙如其言，得吉兆于城西南隅，建城隍之庙。”及《日下旧闻考》卷五〇引《元一统志》：“都城隍庙在大都城西南隅，顺承门里向西。”揆当时之庙址，实近都城之西南交角，明世南拓其城，此庙遂远距城垣几及二里之谱。试自今观象台为起点，经东西长安街，天安门至西单牌楼迤西邱祖胡同西端城之西垣为止，引一直线，正包庆寿寺双塔，及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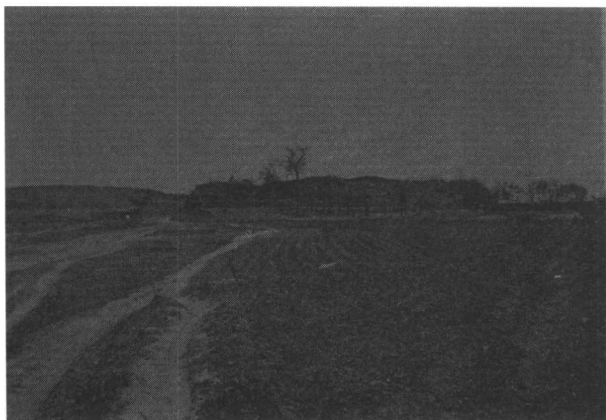
图六 小西门（肃清门）豁子



图七 土城东北角



图八 土城西北角



图九 小西门（肃清门）豁子瓮城遗迹（外侧）



图一〇 小西门（肃清门）豁子瓮城遗迹（内侧）

隍庙于内，而庙之位置，亦适当城之西南交角也（图一、二）。

4 钟鼓楼 元代钟鼓楼之位置，见于载籍者：一，《日下旧闻考》卷三八引《元一统志》：“九年二月……建钟鼓楼于城中”；二，同书卷五四引《析津志》：“齐政楼，都城之丽譙也，……北钟楼，此楼正居都城之中”；三，又同卷引《析津志》：“崇仁倒钞库西中心阁，阁之西，齐政楼也，更鼓譙楼，楼之正北，乃钟楼也”；四，又同卷引《析津志》：“钟楼，京师北省东，鼓楼北”；五，《马可波罗游记》：“城之中心有大殿一，上悬巨钟……。”^⑩根据上述各节，钟鼓楼二楼固在都城之正中，惟按现存钟鼓楼二楼偏处城北，实非全城之中心，缘此二楼乃明清二代所重建^⑪，其位置已较元楼为偏东，证以今旧鼓楼大街之地位可知也。盖元时鼓楼在街之南口一带，钟楼在

鼓楼正北，必在街内无疑，更以此街之地望言之，适当京城东西两垣之正中，足知元之钟鼓楼即在其地。嗣明成祖营北京，大内位置，稍向东移，此二楼亦随之迁改，故至今犹留有旧鼓楼大街之名。今试以旧鼓楼大街为中心，今城北垣展至郊外土城，南垣缩至东西长安街稍南，则其地适当都城东西南北四方之中矣（图一、二）。

综观上举各例，则大都城实为今北平城之前身，惟南北二面，经明世洪武永乐二度改修，缩其北约五里，展其南约里许，而东西两垣，则仍元之旧基，固未稍有移动也。更可推知元城之平面，实为南北较长之矩形，而非正方形（图一、二）。且其全城围度，若按吾人所推论之城墙位置观之，仅五十里左右，实不足六十里之数，《元史》云云，殆非精确，而马可波罗谓城为正方形，每面六英里，全周共计二十四英里之记述^⑫，尤不免言之过甚焉。

四 宫城萧墙及宫城外夹垣

(一) 位置

宫城者，大内之周垣也，建于世祖至元八年³⁹。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曰：“大内南临丽正门，正衙曰大明殿，曰延春阁”，又曰“万寿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阳。”按丽正门者，元大都南面正门也，其地点据前述大都南垣之位置，宜与今天安门平行，而在其稍西，而太液池万寿山（按万寿山又名万岁山）则今之北海与琼岛也。故元宫城之位置，依丽正门与万寿山推之，知与明清二代之宫城，相去非远。惟据《春明梦余录》与《日下旧闻考》所述元大内之旧址，较今故宫稍偏西北，其文如次：

1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初燕邸因元故宫，即今之西苑，……至永乐十五年改建皇城于东，去旧宫可一里许。”

2 《日下旧闻考》卷三二：“明初燕邸仍西宫之旧，……其后改建都城，则燕邸旧宫及太液池东之元旧内，并为西苑地，而宫城徙而又东。”

据上二说，元之宫城，毗近太液池之东岸，而较清故宫稍西，殆为信而有征，惟《春明梦余录》谓明皇城“去旧宫可一里许”，则不无可疑耳。盖现存明清宫城，自永乐创建以来六百年间，未曾迁移其位置，苟自其南北中线，西度里许，定元宫城之中线，再依《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宫城……东西四百八十步”折半推之，则其西垣，必达中南海之内，此为事理所绝不许可，故可决明初东移之距离，不至如孙氏所纪之甚也。又据《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

仪天殿在池中圆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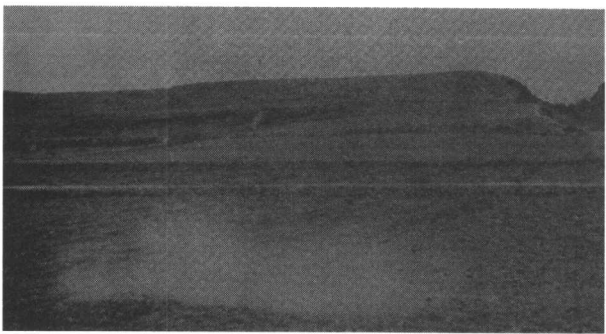
图一一 东土城（南望）



图一二 西土城（南望）



图一三 西小关（健德门）外石桥



图一四 东土城（外侧）

……东为木桥，长一百二十尺，阔二十二尺，通大内之夹垣。

所云仪天殿，即今之团城，其东仅隔一桥，即与大内夹垣相接，则元宫城之西垣，当在今北长街附近矣。由此推论明清宫城东移之距离，恐至多不出半里之遥。且考明永乐帝之营北京，其宫城位置，与南之正阳门，北之钟鼓楼，适在南北中线之上，以此类推，疑元大都亦取同样之方式。盖元宫城以南面中央之丽正门为标准，见《日下旧闻考》卷三三引《析津志》：

世皇建都之初，问于刘太保秉忠，定大内方向，秉忠以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方以对，上制可。今丽正门虽经永乐展筑南垣后，遗迹荡然，无可追索，然元钟鼓楼之位置，依旧鼓楼大街，犹可据为研究线索也。根据此项假说，自旧鼓

楼大街绘一直线，使与大都东西二面之城垣平行，则其方位，适值今故宫武英殿附近，恰与旧鼓楼大街至今钟鼓楼间之距离相等。然则以此线为元宫城之南北中线，或视孙氏之说，更与事实较为切近欤（图一、二）。

以上系讨论元宫城之东西位置，至于宫城南北所界，略见明萧洵《故宫遗录》，其言曰：

南丽正门内，曰千步廊，可七百步，建棂星门，……门内数（亦作二）十步许，有河，河上建白石桥三座，……度桥可二百步，为崇天门。

按崇天门乃元宫城南面之正门，与今午门同一性质。据前引丽正门至此门之距离，约为九百余步，以每里三百六十步除之，得二里半有奇，则元崇天门当与今故宫之乾清门平行，而在其稍西。今以此点为根据，依《辍耕录》所载元宫城“南北长六百十五步”推之，其北面之厚载门，竟达今景山北墙迤外，是元宫城范围，包括今故宫北部与景山一带于内也。虽然，由此假说，则元之万寿山，位于宫城正西，与《辍耕录》“万寿山在大内西北”之说，抵触不合矣。且《辍耕录》称：